

中国儿童电影:原动力何在

□张之路

如果提起儿童电影,可能不少人会问:现在还有儿童电影吗?我们到哪儿去看儿童电影?孩子还需要儿童电影吗?令人惊讶的是,以华表奖的评奖为周期,2010年、2011年两年间,我们拍摄了近100部儿童电影(不包括动画片)。虽然其中有些影片会引发我们对于儿童电影的概念的讨论,但大体上可以归入这个范畴。

笔者最近集中观看了其中的30多部影片,就总体印象而言,能看出国家有关部门对儿童电影的投入,也有一大批创作者有志于此,从我个人的角度,30多部影片看过去,质量还不错,但觉得比较分散,缺乏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不能支撑起近年来儿童电影在美学上的追求和思想话题的关切点。概而言之,丰富多彩的校园、家庭亲情、成长问题、少数民族少年生活、名人少年传记依然是儿童电影比较集中的选题取向。

题材表现:“隔代情”是亮点

近年来,家庭亲情影片增多,这类影片中的成人和儿童往往都是主人公,也有人会认为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儿童电影,但实际上,将它纳入儿童电影的范畴进行评价和运作更加符合当前儿童电影发展的现状。

比如《我们天上见》,很有代表性。它是一部站在今天回忆少年时代的电影,有着明显的成人视角和情感诉求,也未将观众预设为儿童,但它的主人公、故事、视角和整个作品的气质,又有着儿童电影的特质。可以说,在“给予”和“关于”两种姿态的儿童电影中,这类电影属于“关于儿童”的电影,也应视作儿童电影的范畴。尤其是,近年来,因为很多国际儿童电影节中都将“家庭电影”视为重要的门类,所以将这些电影涵括其中,对于我们儿童电影事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天上见》是一个表现“隔代情”的影片。小学生蒋小兰从小没有见过父母,和姥爷相依为命。从小学到中学,姥爷一直呵护着小兰,直到去世。影片以儿童视角、成人口吻,引出一段童年往事,女孩成长中的每一件小事都成为她个人生活中惊心动魄的回忆,在父母缺席的童年里,外祖父是她唯一的亲人。两代人细碎的生活汇成了感情的涌动,在不经意间打动着我们的心灵深处,在那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我们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脉搏,那既是编导个人的童年回忆,也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回忆和情感。影片制作讲究,还原生活到位,摄影技术和影像风格都十分巧妙精美,充满了充沛而有节奏的喜悦和哀愁。老演员朱旭扮演的姥爷更是炉火纯青。

“隔代情”在儿童电影里可以说是成绩非常突出的一部分。一方面这与中国的现实有关系,父母因为忙,经常把孩子放在祖辈家;二是这可以作为家庭矛盾的一个有效解决途径。在这些电影中,在父母和孩子有问题的时候,爷爷的出现是一种解决,因为爷爷这辈人有阅历、胸怀宽广,对孩子的爱又特别突出,这是父母生硬的教育方式和过度望子成龙的期望所不能及的。这类影片

一些事儿
《我们天上见》(左)
《孩子他那事儿》(右)
荣获本
届华
表奖
优秀小
儿影
片奖



在表现“隔代情”时,多突出亲情的宝贵和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比如《小黑鸟》《亲亲我》等;而在表现父母和孩子两代人感情的时候,却多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钢琴少年的烦恼》《琴动我心》《老妈你真烦》《玩酷青春》等,多表现家庭教育和代沟问题。这个社会比较急功近利,反映在家庭里,是面对社会竞争带来的压力,父母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很多代沟问题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这是矛盾的起源。

此外,这些电影让我们感觉到,家庭亲情电影在“事情”和“感情”之间,“情”重于“事”,相比其他题材电影,创作人员的感情更充沛,镜头更到位,看得出这是当下社会大家内心的渴望,也就从另外的角度证明: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观众,儿童电影不是“哄”孩子玩的电影,充沛饱满的情感是儿童电影打动人心、继续前行的动力。

创作不能“旱地拔葱”

因为一直在关注儿童电影,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虽然很多主创人员是带着对儿童的关爱、对电影艺术的热情来拍摄儿童电影,但是从呈现出来的艺术水准而言,还有待提高。其中,最大的一个遗憾是,把儿童电影看得太容易,没有充分重视这个领域已经有的经验和教训。很多制作人既不了解之前有些什么儿童电影,和同行、观众之间也没有交流;另外,从优秀文学作品中借鉴的意识比较薄弱,在这30多部作品中,只有《孩子那些事儿》是根据儿童小说改编的,这就放弃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思想资源。仿佛“旱地拔葱”一样,很多人想当然地拍片子,前期的功课做得太少,和已有的艺术经验脱节,也和现实生活脱节。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拍摄更受欢迎,什么样的电影能够给电影史留下一点痕迹,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考很少。一个电影,从剧本创作到编导摄录美,大到思想意义,小到镜头的运用,都没有借鉴、传承和交流,各自为战,没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影响了我们拍出更优秀的作品,对中国儿童电影的进步是一个阻碍。更糟糕的是,相当一部分制作人看重的是拍儿童电影所获得的国家资助,而且成本低,如果能卖给电影频道,说不定还能有点盈利,缺乏更高的艺术追求,出现了大量“鸡肋型”的电影。

喜剧《火星没事》有很多明星加盟,在儿童影片中可算是比较受“欢迎”的,运用了各种喜剧元素,但不是很到位。它把当下成人生活中的很多社会问题直接放到儿童片里面,显得比较“隔”。一个影片,无论是成人影片还是儿童影片,社会问题应当仅仅是一个起因,如果直接作为内容呈现,会有像新闻简报的感觉。比如片中汽油涨价,小主人公利用魔法把油的价钱降下来,人们拎着大桶小桶争先恐后买油,结果惹出一场风波……这个事件表面上很热闹,气氛烘托十足,但观众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国内外很多优秀儿童喜剧虽然并不取材于现实,但观众会觉得小演员天真可爱,表现出了儿童特有的想象力、强烈的生命力、创造性。大部分国内的儿童喜剧、闹剧在想象与限定之间尚不到位,缺乏童心,制造“包袱”时缺少智慧,常常是网上抄几个笑话就算。

还有部分年轻的导演,得到了拍片的机会,就亟不可待地把自己童年的往事基本上以写实的手法呈现出来,这可以作为个人的探索,但作为儿童电影应该有的典型意义和普适性比较欠缺,视域狭窄。此外,虚构类的影片少,大家没有广泛地去寻找可拍摄的东西,选材撞车、同质化。在这一点上,《孩子那些事儿》的成功值得我们分析。这部影片的故事很分散,由小的人物、小的段落构成,但自然流畅,真实可信,所以能获得好评。它没有“端着”,没有刻意说“孩子话”,但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儿童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情绪,是一部和当下时代结合得比较好的影片。

当然,也有明显的进步。过去很多电影是讲述坏孩子如何变成好孩子,调皮的孩子如何变成乖孩子,现在来看,这样的立意明显少了,从这一点上理解,儿童电影所呈现出来的儿童观、教育观是进步了。比如《孔明灯》,影片讲述了9个新加坡的孩子到中国河北一个偏僻的农村体验生活的故事。影片基本上采取了用记录的方式拍摄然后剪辑而成。吃喝拉撒睡,包括玩耍和上课,孩子们都是形影不离。因为影片朴素真实,所以它带来了一种靠演员表演达不到的力量。观众在这里看到的是孩子们实实在在的文化差异和少年

们那种因为纯真而便于沟通的美好。正因为如此,许多闲笔都变得那样耐看。影片中的孩子们自然放松,表现出自然天性。它之所以获得认可,是现在的观众更希望追求真实,以及真实里所表现的感动和思索。它没有台词的说教,在视角、手法和观念上也没有说教。相比之下,以前我们有很多讲述城里孩子到乡下、外国孩子到中国的影片,往往存在教育物质条件好的孩子珍惜生活、向淳朴的农村孩子学习的观念。而这部影片摒弃了谁好谁不好的判断,只是展示不同的生存环境。看完影片,我会感觉到对孩子来说,物质条件好一点坏一点,幸福都能存在。

无论表扬还是批评,都没有声音

艺术上缺乏创新的这种状况,也不能一味苛责主创人员。因为一个事业如果缺乏社会关注,那就缺少了激励和磨砺、创新和探索的意识就谈不上了。影片好或者不好,没有任何反馈,整个儿童电影的评论处于“无声”状态,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如此一来,也就打击了本来有一点“野心”的创作人员,使他们失去了研究、探索和创新的动力。

比如《我们天上见》应该引起大家“什么是儿童电影”的讨论;《火星没事》的探索与缺憾应该引起我们对儿童喜剧的思考;除了商业大片之外,是否还应该有一些在商业上处于弱势的,对孩子们非常重要的、有艺术追求和先进儿童观、教育思想的影片?这些问题关心的人不多,或者各说各的,没有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去争论,去讨论。说实话,以前的儿童电影还造就了几代童星,还有普遍的社会关注度,现在却寂静无声,连儿童观众都不知道这些电影的存在。观众这边不能从票房上体现,专家也不关心,缺乏表现、检验、表彰、议论、关注的氛围和平台。于是,一谈起儿童电影,很多话题都是“无解”的,感觉很无奈,“无处下嘴”。因为我们谈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谈到具体的作品大家也看不到,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说,而且无论我怎么说,没有人支持你,也没有人反驳你,仿佛是在一个话语的真空里。当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走在儿童电影这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会觉得非常孤单和遗憾——但居然我们两年有近100部电影,这种反差非常滑稽、矛盾、不可理解。

我们明明知道,一个孩子看一部优秀的电

影,在审美、思想和情感的熏陶上,都非常重要,而我们又有大量的优秀影片和新影片,但是除了两年一次的华表奖,平时几乎听不到儿童电影的声音,哪怕是六一儿童节。

现在所谓的儿童电影评论,基本上是两种情况:一是新片出来,以宣传为目的的表扬;另一种或许是因热爱,而生出一种苛责、观点比较偏激,只要谈到中国儿童电影,他们就一言以蔽之——教化,所以儿童电影进不了影院,所以孩子不爱看,所以发达不起来……这种话已经说了30多年了,如果今天的评论家或者媒体认真了解一下具体的影片,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种论调,对儿童电影的发展是一种压抑。但即使这种评论,都很罕见,所以儿童电影就变得非常茫然。

“看到电影”,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话又说回来,人们根本没有途径看到这些电影,怎能去思考和评论它们呢?现在整个儿童电影的生态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有这么多孩子渴望看儿童电影,又有那么多电影已经拍出来,但是他们相互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状,也是多少年的老话题。

因为短期的商业诉求,观众有限的儿童电影基本上被各大院线堵在门外。也有人会说,电影院不要,是因为影片质量太低,说教太强,没人爱看。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一些没有说教的、艺术性很强的儿童电影,同样进不了电影院,包括很知名的国外电影《小鞋子》《放牛班的春天》等。儿童电影的商业属性本身就弱,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扶持它。很多人,比如儿童电影学会,多少年来一直为此呼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收效甚微。

从教育系统的角度而言,因为没有纳入国民教育和公益性体系,儿童电影放映在人力物力资金方面都得不到保证。既然放映儿童电影的费用目前进不了“一费制”,那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孩子看电影谁来买单?应该是当地政府。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支持影院低价、免费给中小学生发放电影票,争取将此项措施纳入教育和公益轨道。中小学要定期开设电影课,电影公司或者制作人也可以选择将学校作为儿童电影首映式场所等。对儿童观众来说,集体观看比个人化的观看(比如通过电视和光碟)效果好得多,孩子们可以讨论,讨论的效果能够影响很多人。现在学校的硬件设备普遍提高,一般都具备投影设备,甚至一些学校的大礼堂都是专业的银幕。采取这种措施,可以极大地改变少年儿童看不到儿童电影的困境,同时这也能较好地纠正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观众群体的流失状况。观看优秀电影并非仅仅是娱乐90分钟,而应该从素质教育的高度去理解。观念转变了,就会发现这点投入是非常少的一点资金。好在目前第二渠道取得了一些成绩,国家电影局也在推进相关的措施,让更多的优秀影片进入校园。

归根结底,儿童电影如果达不到它本身的目的,那么它就丧失了原动力。首先让孩子看到儿童电影,这是最根本的。极端一点来讲,与以往比较,现在拍出好电影和让孩子看到这些电影相比,后者更加重要。只有孩子看到了儿童电影,他们来一起评论、反馈,这才是中国儿童电影的原动力。

这堵隔开阴阳两界的庄严的高墙面前,一家人达到了对爱的最深领悟。书中这样写道:“爸爸、妈妈,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我们都是容易变老的人,脆弱的人,需要温情的人,没必要走极端的人,有一半冲动有一半隐忍,这就成了我们一桩桩人生。有时候阴雨朦胧,有时候阳光灿烂。”

也许这就是普通的一生,没有极端的爱,也没有极端的恨,人性中隐藏着仁厚的底子,在一次次的考验中,在一次次情感的磨砺中,走过了激流险滩,把一条羊肠小道走成了宽大的大路,让人一点点看到亲情的厚度、宽度和温度。这就是韩青辰,这就是韩青辰所理解的人性、人生和亲情。她要的是“恕”,是“理解”,是仁慈的爱。这本书与其说是怀念父亲,不如说是她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赎。在反复的诉说中,在喃喃低语中,她一点点缝补上了童年因为父亲不在家而空着的那块父爱,她对父爱的饥渴,她因为缺少父爱而生出的自卑,都在流水般舒缓的回忆里,一一得到温情的抚慰。

这是一部成长散文。她把自己的内心那么坦诚地打开来,每一处细微的皱褶,每一道小小的伤痕,她都告诉你这其中所凝聚的酸甜苦辣,她不回避心灵成长的艰难和期间的迂回曲折,但最终,她总能把生命中的辛苦、尴尬、悲痛和失去都化成爱,化成感动。

吕中山同志逝世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吕中山同志,因病于2011年8月30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77岁。

吕中山,曾用名钟山。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小说集《新芽》《逃婚女》,长篇小说《五女奇侠传》(合著),散文集《祝福祖国》《垦荒路上》,报告文学集《中流砥柱》,长篇报告文学《还有美景在前头》《兵工厂长》,影视文学剧本集《大雪歌》等数十部作品。



“巴巴爸爸”:

再续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

□本报记者 刘秀娟

“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拉拉、巴利波、巴巴伯、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巴布拉伯……”

“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8月20日,在《巴巴爸爸》作者德鲁斯·泰勒中国行欢迎仪式上,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再次念起珍藏在无数中国观众心底的“口诀”,唤起了大家对“巴巴爸爸”和童年的怀念。性情温和、乐于助人、治家有方、憨厚智慧的巴巴爸爸是全世界无数孩子心中的“模范爸爸”。

与中国缘未了

“巴巴爸爸”系列是法国人泰勒和妻子安娜特·提森共同创作的一套图画书,首次出版于1970年。1975年,联邦德国将故事改编为同名动画片,并于1981年在美国首播,中国播出该动画片是在1988年,巴巴爸爸一家随意变形的能力、温馨快乐的生活赢得了当年众多小观众的喜爱,绕口令一样的开场白很多年至今记忆犹新。自从有了网络,泰勒不断收到来自中国的邮件,中国读者很关心巴巴爸爸一家有了什么样的新故事。

但是,“巴巴爸爸”来到中国并非一帆风顺。当年的动画片因为版权等问题,未能再重播;而“巴巴爸爸”系列图画书经过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八年抗战”才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已经是2010年,当年看着动画片长大的一代人刚刚做了父母,于是,仅仅一年的时间,“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图画书销量近百万,可见一代人对“巴巴爸爸”的

热爱。

泰勒也同样喜欢中国。他的首次中国行原定一周时间,但没想到中国如此有吸引力,欣然改变计划,在北京与媒体、作家见面之后,八旬老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书展和北京书展,热情高涨地和中国作家、读者交流。虽然第一次到中国,但是泰勒和中国却颇有渊源。“二战”期间,他的父亲作为运河专家被派往上海工作。少年时,泰勒经常听父亲描述沦陷的上海如何照样跑马,“日本人以为他们已经控制了中国,但是他们并没有”,“中国已经走了几千年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父亲说自己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泰勒自己对中国船舶兴趣浓厚,熟悉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中国船舶,自信地称,比在座的任何一位中国记者都更了解中国船舶,他盼望此行能有机会参观中国船舶博物馆。

在“巴巴爸爸”系列中,泰勒曾经提及中国动物,接下来的创作中,他将更多地引入中国元素,因为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正在学习汉语和毛笔字。用爱描绘每一笔

在中国的各项活动,泰勒都是身着粉色的宽大衬衫,让人一下就知道这是“巴巴爸爸”。这个形象的灵感来自法国孩子们喜欢的棉花糖。在法国,棉花糖就叫“巴巴爸爸”,而且也是粉色的。因为妻子刚刚过世,“巴巴爸爸”



对泰勒而言,更具有纪念意义。在媒体见面会上,他一直强调妻子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实际上是协助的”,“安娜特非常喜欢大自然和动物,由于受她环保意识的影响,‘巴巴爸爸’一开始创作就对环保很感兴趣”。看到中国有电动自行车,泰勒非常赞赏这种节能环保的出行方式。因为妻子善良、温柔,所以作品传达出很人性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大团队制作不同,我们是个体性的创作,我们自己在画这些动物时都会跟着笑,创作中个人的感情最重要”,泰勒说这是工业化已经控制了中国,但是他们并没有”,“中国已经走了几千年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父亲说自己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泰勒自己对中国船舶兴趣浓厚,熟悉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中国船舶,自信地称,比在座的任何一位中国记者都更了解中国船舶,他盼望此行能有机会参观中国船舶博物馆。

在“巴巴爸爸”系列中,泰勒曾经提及中国动物,接下来的创作中,他将更多地引入中国元素,因为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正在学习汉语和毛笔字。用爱描绘每一笔

在中国的各项活动,泰勒都是身着粉色的宽大衬衫,让人一下就知道这是“巴巴爸爸”。这个形象的灵感来自法国孩子们喜欢的棉花糖。在法国,棉花糖就叫“巴巴爸爸”,而且也是粉色的。因为妻子刚刚过世,“巴巴爸爸”

对泰勒而言,更具有纪念意义。在媒体见面会上,他一直强调妻子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实际上是协助的”,“安娜特非常喜欢大自然和动物,由于受她环保意识的影响,‘巴巴爸爸’一开始创作就对环保很感兴趣”。看到中国有电动自行车,泰勒非常赞赏这种节能环保的出行方式。因为妻子善良、温柔,所以作品传达出很人性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大团队制作不同,我们是个体性的创作,我们自己在画这些动物时都会跟着笑,创作中个人的感情最重要”,泰勒说这是工业化已经

童心·世界



《威廉·退尔》插图

湖北少儿社出版

第289期

儿童文学评论

电话:010-65002492、65935482

传真:010-6500249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